

宗教與戰爭

——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

• 王 柯

摘要：儘管日本本來沒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傳統，但是在注意到對其擴大勢力範圍的利用價值後，從1920年代開始有意識地接近伊斯蘭勢力。進入1930年代後，隨着侵華戰爭的擴大，日本更是借助流亡到滿洲和日本的土耳其—塔塔爾人社群，致力於以「回教圈」的名義建設跨越國界的「回教空間」。然而，這是一個表象和實質並不完全重合的、被想像出來的二重空間。從表面上來看，好像包括了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富汗等中東—阿拉伯和中亞各國，但是戰時日本「回教圈」話語的最大的關注還是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的回教族群；而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回教在其侵略的前線——中國，培植國外民眾與日本之間的「共同體意識」。戰時日本的「回教圈」話語，其實是為了跨越中日兩國的「民族國家」高牆而被「發現」的。因為宗教具有跨越國界的力量，利用宗教的名義不僅可以為侵略活動尋找正當化根據，而且可以軟化中國回教民眾對侵略戰爭的反感心理。

關鍵詞：「回教圈」 伊斯蘭教(回教) 共同體 日本侵華戰爭 「回教中國」

隨着恐怖主義的威脅橫跨國界向世界各地擴散，圍繞着伊斯蘭教^①的許多問題愈來愈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但是較少為學界注意的是，1930年代日本為了發動侵略戰爭，曾經有過一段主動接近和向日本國內引進伊斯蘭教、並利用伊斯蘭教向外擴張勢力範圍的歷史。關於這段歷史，1943年中國回族學者楊敬之曾著《日本之回教政策》加以審視，該小冊子提綱挈領，但因缺乏具體資料，不僅篇幅少，且敘述較簡略^②。日本方面，自小就信仰伊斯蘭教的教職人員小村不二男1988年出版的大作《日本伊斯蘭史》，按照年代、事件、人物等方式分別整理了1930年代日本接近、引入和利用伊斯蘭教的歷史過程，堪稱日本伊斯蘭史之集大成^③。但是，由於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場，未能對戰時日本的伊斯蘭教政策給予客觀的分析。

日本國內關於戰時日本與伊斯蘭教之間關係的研究在數量上一直很少，但是近年隨着史料的發掘和研究視野的擴展，不少頗有見地的研究相繼問世。如松長昭《在日塔塔爾人——被歷史所愚弄的伊斯蘭教徒》、渡邊賢一郎〈戰前神戶塔塔爾人的生活與活動——移民·共同體·網絡〉，以及俄國塔山地區留學日本的烏斯曼諾娃(Larissa R. Usmanova)〈戰前東亞的突厥系塔塔爾移民的歷史變遷備忘錄〉、其博士學位論文〈1898年至1950年代東北亞地區離散突厥系塔塔爾移民社會意識變化過程的歷史考察〉(“An Historical Account to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urk-Tatar Diaspora Consciousness in North East Asia between 1898 and the 1950s”)等^④，均根據各種歷史資料詳細分析戰前流亡到日本各地的突厥系塔塔爾人社群的狀況，以及他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在日本的伊斯蘭教政策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以上聚焦於在日塔塔爾人社群的研究之外，重親知左子的〈宗教團體法的成立與回教公認問題〉關注了戰前日本伊斯蘭教政策與黑龍會之間的關係；坂本勉編著的《日中戰爭與伊斯蘭——在滿蒙·亞洲地區的統治與懷柔政策》一書，利用原始資料深入考察了日本在滿蒙地區實施統治過程中的伊斯蘭教政策；島田大輔的〈關於昭和戰爭時回教政策的考察——以大日本回教協會為中心〉一文以成立於1938年的「大日本回教協會」的活動為中心，分析了二戰前日本政府的伊斯蘭教政策^⑤。

然而不能不承認的是，這些研究都沒有將日本政府的伊斯蘭教政策與中日戰爭二者有機地、系統地聯繫在一起進行考察，因而未能揭示出原本並沒有幾位穆斯林的日本突然出現一場「伊斯蘭熱」的深層原因。因此，本文聚焦於1930年代日本政府建構「回教圈」的問題，通過利用各種檔案還原其建構「回教圈」的實踐過程與發動侵略戰爭之關係，以此為基礎剖析日本關於「回教圈」的思想及其實質。

一 在「東突厥斯坦」發現「同胞民族」

1939年11至12月，由大日本回教協會與「東京回教徒團」^⑥主辦的「大回教圈展覽會」分別在東京的上野松坂屋(11月7日至19日)和大阪的日本橋松坂屋(11月28日至12月9日)舉行。由世界各地被邀請出席展覽會的約四十名回教徒代表，在日本受到了盛大的接待。從11月16日的「宮城遙拜」開始到11月30日在神戶清真寺舉行「解團式」為止，這些代表先後訪問了日本的總理大臣、外務大臣、文部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拓務大臣、商工大臣以及各家大報、各地的官廳和商工會議所，此外還到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箱根等地觀光，參拜了明治神宮、平安神宮、湊川神社，參觀了軍事演習、理化學研究所，視察了工場和市場，而且幾乎每天都有午餐會或晚宴^⑦。

關於當時這些備受日本政府重視的回教圈展覽會獲邀代表，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當中有九名「東突厥斯坦」(「回疆」，新疆南部)的代表。11月6日，駐內蒙古厚和總領事代理望月靜給日本外務大臣野村吉三郎

的電報中，談到當時居住於厚和市通道街二十八號的兩位「支那新疆省吐魯番」的「回紇族」代表，他們分別是二十四歲的土耳其順和三十八歲的馬一德^⑧。從發音上看，土耳其順可能就是〈回教圈展覽會來朝代表者〉名單中的「托乎提伯克·吐爾地」(Tohutbeg Turd)，據大日本回教協會所編《記錄回教圈展覽會：全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會來朝回教徒視察團》中的名單上顯示，他的職務是「原軍官」，而九名代表的負責人為「麻木提·莫合提」(Mehmut Muhiti)，名單上所標明的職務為「東突厥斯坦原指揮官」^⑨。由此可知，被邀請參加回教圈展覽會的維吾爾族代表基本上都是新疆近代史上有名的事件——「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當事者。

關於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過程，拙著《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進行了大致描述^⑩。由日本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查部編著、現藏於日本防衛研究所的《回疆獨立運動概説(從獨立戰爭到支那事變)》，詳細記載了這些當事者在運動之後如何與日本官方建立關係的過程^⑪。按照該文獻的說法，1934年夏，被選為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時建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府主席的和加·尼亞孜(Hoja Niyaz, 哈密人)，就任了烏魯木齊盛世才政府的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麻木提(吐魯番人)繼和加·尼亞孜之後率領他們當年由哈密—吐魯番地區帶來的維吾爾族人部隊，駐屯在以喀什噶爾為中心的新疆南部地區。其間，麻木提派遣其兄莫思爾·巴依(Musil Bay)到麥加朝拜，之後到土耳其秘密訪問了駐當地的日本大使，「懇請得到日本援助」，以改變他們的處境^⑫。當時駐土耳其日本大使的回答為：「當前維吾爾族若與蘇聯開戰絕非上策，應在表面上盡量締結和平友好關係，同時積蓄實力，將來蘇聯壓迫加劇陷入苦境時，麻木提可以逃亡國外，我們那時會加以保護並探討等待將來時機的方法。」^⑬由此可知，最初並非是日本政府，而是這些維吾爾族人主動靠攏日本。也就是說，在中國建設近代國家的過程中被邊緣化的民族集團，利用中日兩國瀕臨戰爭的時機來為目下面對的政治困局尋找出路。

然而不久之後，麻木提就接到了蘇聯方面讓他到烏



1939年11至12月，由「大日本回教協會」與「東京回教徒團」主辦的「大回教圈展覽會」分別在東京的上野松坂屋和大阪的日本橋松坂屋舉行。(圖片由王柯提供)

魯木齊報到的命令，並因此感到生命危險，遂於1935年4月流亡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立即派遣莫思爾再到駐土耳其日本大使館說明情況，日本大使告訴他們，「應在印度等待，一旦時機到來立即實施行動」。但是流亡中的麻木提被駐加爾各答的中華民國領事所察覺，於是國民政府命令麻木提到南京覆命。麻木提擔心抵達南京後會遭到監禁，遂派了兩名軍官作為他的代表去到南京。兩名軍官於1937年9月2日到達南京，之後面見蔣介石委員長，「報告了蘇聯在新疆省的暴行及因此為居民帶來的困苦，懇請借中央政府之力予以解決」。然而，「蔣委員長回答道，現在中日開戰，當前蘇聯按照密約對中國進行援助，所以在新疆問題上無法反對蘇聯，中日戰爭結束後必當着手解決新疆問題」。的確，在抗日戰爭初期，當時支援中國的只有蘇聯^⑭。最後，這兩名感到失望的軍官於1937年10月2日去到上海，與當地同志取得聯繫。

1939年11月2日，駐上海日本總領事三浦義秋發給外務大臣野村的「三八六八二」號電報（即就邀請出席回教圈展覽會代表一事的報告）中，提到了一位「一直屢屢向本館提供關於新疆情報」的「哈米提·哈吉·依司馬義爾」（Hamit Haji Ismail）^⑮。估計就是通過他的幫助，11月17日，兩名軍官「以書面報告形式向駐上海日本領事詳細報告了新疆及蘇聯的狀況和動向、住民的反共產主義情緒，此後開始和領事館保持頻繁聯絡」（湊巧的是，和加·尼亞孜於1937年10月12日被盛世才逮捕，其罪名為派遣親信到綏遠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絡，準備在新疆建立「回教國」^⑯）。另一方面，英國方面得知「駐上海的維吾爾軍官與日本機關保持秘密聯絡」，於是立即發出「禁止麻木提繼續滯留印度，立即出國」的命令。束手無策的麻木提不得不提交了於1939年3月4日之前退出印度的誓約書，並「秘密與駐孟買日本領事聯絡，提出自己有到日本的意向，只看對方意見如何。日本領事馬上向本國詢問，立即得到本國答覆可以的回電。於是3月2日〔麻木提〕瞞着英國當局秘密登上由孟買出發到日本的遠山丸，3月23日到達上海，與流亡於上海的十餘名軍官取得聯絡，27日出發，4月1日抵達神戶，4月6日到了東京」^⑰。

1939年4月麻木提到達東京以後，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後流亡各地的維吾爾族，「以麻木提為中心聯絡和團結在一起，在各地準備東山再起。其潛伏狀況為，東京是麻木提及其追隨者，另外在上海、厚和、印度、近東等地分別計劃行動，民族獨立的思想愈燃愈烈」，準備在「東洋盟主日本」的支援下再次發動獨立運動^⑱。值得注意的是，當初日本曾經稱這些維吾爾族人為「支那新疆省吐魯番」人，然而在回教圈展覽會的代表名單上，他們的「國別」卻成為區別於中國的「東突厥斯坦」。也就是說，日本的態度已經明確轉變為支持「東突厥斯坦」的獨立運動。

那麼，對於戰時日本來說，「東突厥斯坦」究竟具有何種作為「國家」的價值呢？關於這一點，《回疆獨立運動概說》也做了明確的表述^⑲：

不僅從軍事的角度、而且從將來治理支那、對抗蘇聯的國防角度來看，日本控制滿洲、內蒙古、新疆這一與亞細亞中心的連接地帶都是絕對必

要的。該地的回教民族從血緣上看與日本具有深深凝結、永久不變、一身同體的關係，如果出現一個維吾爾自治國，必將極大刺激與西方鄰接的同民族佔大多數的俄領突厥斯坦以及俄領中央亞細亞一帶居住的八百萬回教徒。同時，如果北上可以使俄領極東地方陷入孤立，如果南下不難想像可以極大刺激印度鄰接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日本如果積極援助印度民族就容易取得成效，那時必定置英國於狼狽處境。這樣做在外交中絕對對日本有利，至少可以使任何歐美國家都無法再插手東洋問題，而退後百步專心於維持可能成為最後戰線的海峽殖民地，但日本卻不需戰爭即可名副其實地成為東洋之盟主。由此可以斷定，解決新疆問題絕對是一項必要的緊急工作。

也就是說，從軍事上來看，「東突厥斯坦」正處於國際政治的要衝，如果將其收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不僅可以抑制中國，甚至可以抑制蘇聯、英國以及歐美各國的勢力，使日本更加容易鞏固「東洋盟主」的地位。而其具體方法，就是建立由「回教民族」組成的「維吾爾自治國」。這樣，新疆再不是中國領土，維吾爾族人也不是中國國民。就如《回疆獨立運動概說》所言：「新疆之地古來稱為突厥斯坦，即土耳其人之故地，全部為維吾爾即土耳其族固有之地域。該地域被支那稱為新疆（新的領土之意），進入支那的版圖是在清乾隆帝時代（西曆 1758、1759 年）被征服以後的事。」^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新疆遙遙相隔的日本，對於它支援獨立運動勢力的行為，居然使用了「同胞民族」的口實：「〔維吾爾〕民族是一個純粹的土耳其（即土耳其）族，語言為純粹的土耳其〔原文如此，應為土耳其〕語。而與我大和民族為同系統的阿爾泰民族的原種族，相貌上也酷似日本人，……性質及性格也令人想起日本古武士之風格」，維吾爾人「從整體看來與吾國人相似點極多，的確是值得我們愛護的同胞民族」^③。當維吾爾族被認定為「從血緣上看與日本具有深深凝結」的關係的「同胞民族」時，日本理所當然地產生了一個新的義務，因為維吾爾人「深深信賴日本及日本人，吾等日本民族當然具有對於這些祖先相同的同胞民族的困境進行支援的義務，這也是我們對於我們祖先的重大義務」^④。

日本和維吾爾族是不是「同胞民族」不屬於本文的討論範圍，但是，一貫主張自己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在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背景下為甚麼會在「日本民族國家」之外又去「發現」所謂的「同胞民族」，卻是一件值得引起思考的事情。可以想像的是，日本軍部已經注意到強烈主張「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國家思想」事實上成為了阻礙日本向海外擴張的壁壘，於是提出「同胞民族」的概念，以便在「單一民族國家」的高牆之外也能夠培植出一種日本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共同分享的「共同體意識」。日本與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歐美國家的殖民地統治政策不同，其中「給落後的殖民地帶來了先進的文化」這種居高臨下的意識並不十分強烈。或者說，日本更擅長於通過「發現」共通性、編織出各種關係和演出各種親密性的手段，在其侵略的前線——中國建構一種與日本血脈相連的「共同體意識」來正當化其侵略行為。前述的「該地的

回教民族從血緣上來看與日本具有深深凝結、永久不變、一身同體的關係」的發明，正是其中一例。這也說明，日本政府對「東突厥斯坦」所表現出來的關心，只是它企圖懷柔整個中國回教族群的一部分；而懷柔整個中國回教族群的工具，就是它建構的「回教圈」話語。

二 「大回教圈展覽會」的舉辦與中國的回教徒

實際上，1939年11月上旬舉辦的「大回教圈展覽會」的計劃書是在當年8月才制訂的。也就是說，展覽會從其規劃到實現僅僅只有三個月的時間。當然，這種事情如果沒有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務省和軍部的協助（毋寧說是主導），則無論如何也是無法實現的。展覽會代表的具體人選是由大日本回教協會掌握，然而這些代表的「資格」和所代表的地域，無疑是根據日本的國策來決定的。通過當時的日本外交文書檔案，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協會和東京回教徒團對代表的選定標準。例如前述的「三八六八二」號電報已經說明，這些代表主要是已經與日本有聯繫、並且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人物。

大日本回教協會也承認，「作為回教對策之一、在外陸海三省秘密地後援之下、由大日本回教協會主辦的回教圈展覽會，「得到了我國內外關係各官公署、公私諸團體及回教圈諸國的絕大的支援」。11月7日，外務省以外務次官的名義向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戶各市長和商工會議所「會頭」發出〈關於回教徒的視察本國希望提供便利〉的信件，要求「此次計劃由該協會〔大日本回教協會〕負擔和負責從滿洲國、北支、南洋方面邀請約四十名回教徒有志者來本國並視察名古屋、京都、大阪及神戶各地，各地當局應盡一切力量提供方便」²³。

由於會期迫近，1934年在關東軍支持下，由川村狂堂策劃成立的「滿洲回教協會」²⁴於1939年10月12日發出了〈關於提供向大日本回教協會主辦回教圈展覽會出展滿洲回教展品的通知〉的第14號訓令，提出在各地徵集展品，其中包括「美術：古經、古書、古畫、寫真（名勝、清真寺、古迹）；美物：古物、奇異古物、穆斯林的名產（如藥品、菓子、糖果，以及其他特製物品）」。從這個訓令中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協會與滿洲地域之間的聯絡是通過滿洲國政府的「民生部禮教課」進行的，出席者一律由民生部代理辦理旅行手續，旅費則自行負擔，但是在日本逗留期間一切所需由大日本回教協會招待²⁵。

事實上，最後選定的六位滿洲代表都是非常政治化的人物。負責人洪啟濬為「滿洲國第一軍管區司令部部附陸軍步兵上校」，其餘分別為「〔滿洲回教協會〕總會總務科長韓鵠洲、協和會中央本部囑託張世海與奈嚕、奉天代表楊進之會長，指導者為民生部社會科宗教系長栗原敏」²⁶。除了韓鵠洲、楊進之以外，在〈回教圈展覽會來朝代表者〉名單上可以進一步看出他們的職務。洪啟濬是「滿洲回教協會總監」、滿洲軍中將王殿忠的「代理」，張世海和奈嚕（印度人）所屬的「滿洲國協和會」是一個在關東軍和日系官吏「指導」下設置的官民一體的教化組織。不用說，「指導者」栗原敏是一名日本人²⁷。

問題在於，當時日本政府為甚麼要如此匆忙決定舉辦這次展覽會呢？毋庸贅言，當然就是為了爭取中國周邊的回教國家或族群支持其侵略戰爭。〈回教圈展覽會計劃書〉介紹此次展覽會的目的為以下五點：「(一) 認識回教圈事情；(二) 介紹回教文化；(三) 促進與回教民族的善鄰關係；(四) 促進與回教圈的經濟提攜關係；(五) 邀請有影響力的回教徒。」但是在「趣旨」部分又做了更加具體的說明，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必須看到，如果同時能夠利用此次機會請回教圈諸國攜帶貴重展品的多數代表來朝，使之觀察事變發生之後我國的實情、加深認識，可以使本次展覽會的意義變得更為重要。」⁶⁹也就是說，除了向日本社會介紹「回教圈」之外，通過舉辦展覽會建立並深化與「回教圈」國家的關係也是一個重要的目的。

那麼，此次展覽會所設定的「回教圈」，具體是指哪些國家或地區呢？在計劃書的書寫順序上，被設定為後援團體的首先是日本政府各省廳和「日本商工會議所、國際文化振興會、有名的新聞社及其他回教圈關係諸團體」；之後第二行寫上的是「滿洲國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蒙疆自治政府、中國回教總會聯合會」；第三行寫道：「土耳其大使館、埃及公使館、伊朗公使館、阿富汗公使館、各地伊斯蘭教團等」。也就是說，展覽會的主辦者將「回教圈」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就是中國各地，也就是中日兩國的交通地帶；第二才是與日本有外交關係的中東—阿拉伯和中亞地區各個回教國家。這一排列次序說明，日本在中日戰爭期間設定了「回教中國」這樣一個回教的「空間」，其「回教圈」的焦點始終凝聚在「回教中國」之上，而這一點從實際邀請出席回教圈展覽會的人數比例上也可以得到證實。

實際出席了回教圈展覽會的一共為41人。其中也門為2人，分別為宗教大臣和他的「侍者」，也就是說實質上只是一人；爪哇(印度尼西亞)為6人，但其中一人為負責人的夫人；阿富汗為1人。除此以外；還有與中國有關的地區人員，其中包括「偽中華民國」各方面15人、「東突厥斯坦」方面9人、「滿洲國」方面6人；另外還有2人為「土耳其—塔塔爾」(下稱塔塔爾人)的代表——「伊黛爾·烏拉爾·土耳其·塔塔爾(İdel Ural Turk Tatar)文化協會」的遠東方面副會長和理事，而實際上這個協會的本部當時就設在滿洲國的奉天。從這些代表來自的地區和比例可以看出，回教圈展覽會從其計劃階段開始，最為關心的就是中國的回教族群。換言之，日本匆忙舉行回教圈展覽會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抓緊強化與中國回教徒之間的合作關係。因而，從時間上推測，前述計劃書中的「事變發生」就是指1937年7月7日發生的「盧溝橋事變」。

在展覽會獲邀代表中，中國與滿洲國的代表人數事實上佔了代表總數的八成，可見當時日本非常重視從「回教」的視點上看待中國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滿洲國的代表中有栗原敏這樣的「滿洲國代表補導者」，在「偽中華民國」的代表中有佐久間貞太(即下文提到的佐久間貞次郎)這樣的「廣東回教自治會顧問」、三谷亨這樣的「中國回教總聯合會顧問」和高橋吉生這樣作為「中國回教總聯合會引領者」的日本人⁷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從有日本人隨行這個事實來看，與中國回教徒維持友好關係一向最受日本政府重視；它也同時說明，這些中國的回教組織本身很可能就是由日本人所直接控制的。

藉展覽會之機，1939年11月18日，大日本回教協會在東京日本俱樂部的大堂召開了原本在計劃書中沒有出現的「世界各地來朝回教徒大會」。在會上，許多代表呼籲：「感謝給了舉辦如此光榮大會之機會的大日本帝國和大日本回教協會，以緊急強化全回教徒的大同團結為要務，確立並使其具體化為今後一致協力的活動方針」，大會還決定「以本次會議為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會」，「今後繼續每年召開一次大會，在東京召開翌年的第二次大會」^⑩。

毫無疑問，日本非常期待以「回教圈」的名義建立一個跨越國界的「回教空間」。然而應該看到的是，這個「回教空間」實際上是一個表象和實質並不完全重合的、被想像出來的二重空間。從表面上來看，這個「回教空間」好像包括了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富汗等中東—阿拉伯和中亞各國，也就是當時日語中所說的「回教圈」；但是對於日本來說，這個「回教圈」不過是一個範圍並不清晰的表象，其最大的關注還是在於包括滿洲國在內的中國回教族群；而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回教圈」這一工具在中國的回教族群中培植一種與日本緊密連結的「共同體意識」。當然，日本之所以會對中國的回教族群具有如此大的興趣，還在於他們對中國回教徒勢力的估計：「世界上回教徒的總數達到四億，分別居住在滿洲、支那、南洋、印度、近東、中央亞細亞及非洲地區。」^⑪他們認為滿洲的回教徒人數為二百萬，除此之外，中國的回教徒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⑫。若能將中國回教徒拉入自己的懷抱，無疑有助於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三 日本中心論：「回教空間」的建構

1943年1月，當時的大日本回教協會會長、陸軍中將四王天延孝（副會長為小笠原長生海軍中將），曾經計劃再度舉辦回教圈展覽會，關於其意義說明如下：「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已經過了一年，值此敵人拿出必死反擊之態勢，決戰進入長期階段之秋」，在他們的念頭中，「南方地域中住民的大半為回教徒」，所以「現今真是作為大東亞指導者的日本完備與共榮圈內各民族建立友好關係、以殲滅共同敵人之際」^⑬。由此可以看出，為戰時日本所真正重視的「回教空間」，事實上是與其勢力範圍高度重合並隨之變動的。毋庸贅言，建構這個「回教空間」的目的，就是要給各地的回教徒營造一種日本作為回教的友好的理解者和保護者的印象，從而有助於向他們灌輸日本的「共同體意識」，讓這些回教徒不再反抗日本侵略，甚至成為日軍的合作者。但是問題在於，原本回教徒人數幾近於零的日本，何以敢於產生自己成為「回教空間」中心的想法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回顧過去、尤其是回教圈展覽會舉辦之前日本社會與回教之間的關係。

據回教圈展覽會計劃書的說法，「從來把與回教諸民族的互助等閒視之」的日本突然想到召開回教展覽會的直接契機，其實是「回教禮拜堂的落成、也門國王子的來朝、日本飛機『疾風號』飛行伊朗等事件」^⑭。1938年5月12日，東京清真寺舉行了落成儀式，日本政府、東京市市長都派出了代表，此外還

有川島義之大將、山本英輔大將等預備役軍官，日本社會右翼勢力首領頭山滿、意大利大使、阿富汗和埃及公使代理，以及由日本國內各地和印度、中國、滿洲邀請的回教徒代表合計500名以上出席了儀式^⑤。外國來賓都是通過當地的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邀請而來，其逗留費用也是由日本政府支付^⑥。很明顯，日本政府希望通過東京清真寺的落成，向各國回教徒進行宣傳：日本「同情」和「寬容地理解」回教徒，「認真保護」回教，甚至對「回教學校及其他文化設施」提供「經濟援助」，具有與回教徒一致的價值觀^⑦。

當然，這種建構「回教空間」的活動，並不限於東京清真寺的建立。正如小村不二男指出那樣，「毋寧說，東京清真寺創建的大前提，是大日本回教協會的設立」^⑧。1938年，「為了響應〔日本的〕大陸回教徒政策」，「由外務省背後推動設立」^⑨、以前首相林銑十郎陸軍大將（預備役）為會長的大日本回教協會成立時，在東京九段軍人會館舉行了盛大的發表儀式。「昭和十三年中，在日本內地東京清真寺創建和設立大日本回教協會兩個大典盛大地舉行，猶如互相呼應一般，2月在北京的懷仁堂舉行了盛大的中國回教總聯合會成立大會。……另外，12月在內蒙綏遠歸化城舉行了西北回教聯合會的創立總會。」^⑩可以看出，大日本回教協會正是與在中國舉辦的回教活動相呼應，為了將日本建構為「回教空間」的中心而設立的。

但是在現實中，如果要將日本建構為回教徒「回教空間」的中心，必然會遇到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首先就是日本的回教徒人數極少的問題。信者雖少但卻要成為「中心」的矛盾，在戰時日本政府為了強化社會統制而制訂的《宗教團體法》中就表露無遺。1939年4月8日，帝國議會公布的《宗教團體法》第一條規定：「本法中所指的宗教團體為神道教派、佛教宗派及基督教其他教團（以下簡稱為教派、宗派、教團），以及寺院及教會」^⑪，其中並沒有列入回教，也就是說，該法並沒有承認回教為日本的合法宗教團體。重親知左子指出：「適用這一法律的教團進入文部省的管轄，承認為合法的宗教，沒有被適用的新興宗教等遭到了嚴厲的鎮壓。」^⑫但是，與對待這些新興宗教相比，日本無論朝野在關於如何處理「回教」的地位問題上都明顯表現出寬容的態度。還在國會審議法案的階段，儘管文部大臣荒木貞夫已經明確地說：「本來此宗教團體法為在國內對宗教進行管理而設，回教由於在國內教徒人數少，雖然沒有如佛教、基督教一般提到其教名，但是包含在了其他教團之中」，但是「〔1939年〕3月23日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安藤委員長要求總理大臣親自就回教（地位）明確說明政府的見解」。首相平沼騏一郎回答道：「回教雖然沒有在宗教團體法中明確提到，然於本案即將成立之際，回教也和一般宗教相同，只要具備相當的條件，就可以適用於本法關於教會等的規定，接受公正的監督和相當的保護。回教具備這些條件，關於這一點我相信沒有任何能夠質疑的餘地。」^⑬

指出「建設東京清真寺背後的主角為黑龍會」的重親知左子，注意到黑龍會副會長、主幹葛生能久所說的話：「儘管不是回教國家，也盡可能朝着同情回教的國家、政府公認回教的方向為制訂各種條約而努力。」^⑭也就是說，即使得不到「公認」，日本社會也有必要為了宣傳而圍繞「回教公認問題」發動一

場論爭。葛生能久還是大日本回教協會的最高幹部，「大日本回教協會很有可能希望動員輿論製造回教公認的東風」^④。關於這一點，重親知左子指出在大日本回教協會的秘密文件中有這樣的記述：「由於回教徒大眾至今依然無知，只要沒有遇到外敵時，就會互相排擠，因此今天對回教徒的再組織十分重要。……回教徒抱着滿腔信賴期待着日本的奮起，那麼我國就要從現在開始認識到自己肩負的使命，不負這些回教徒的信賴而決然推進大東亞的建設。」^⑤很明顯，大日本回教協會關心的不是以保護回教徒為中心的回教政策，而是為了讓日本得到指導回教徒地位的回教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的回教徒卻並沒有因為得不到「公認」而表現出不滿，其理由相信就是他們也知道當時日本的回教徒人數過少。重親知左子指出，「文部省根據宗教局長提出的教會數50、信徒人數5,000名以上的教團認可條件，對神道教派、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既成宗教團體進行統制」^⑥。但是當時日本社會中人數最多的回教徒其實是塔塔爾人社群，據統計，1945年在滿洲的塔塔爾人約為1,210人，而在日本國內的回教徒，神戶200人、東京40人、名古屋50人等，全國一共不過300人左右，可見即使加上塔塔爾人，當時日本國內的回教徒人數也並不多^⑦。這數字應該與1939年日本的塔塔爾人數目不會有很大的出入。根據以上理由，重親知左子認為1939年的「回教公認問題」，「與建設東京清真寺、舉辦回教圈展覽會一起，不過是由黑龍會主導的製造日本接受伊斯蘭的三大對外表演而已」^⑧。換言之，不過是戰時日本政府為了製造一個日本處於「回教空間」中心的虛象的幾個表演而已。

四 在滿洲「發現」回教

通過「回教公認問題」、「建設東京清真寺」、「舉辦回教圈展覽會」這「三大對外表演」，日本製造了一個處於「回教空間」中心的虛象，這些活動都是以東亞地區以及日本社會中塔塔爾人的存在為前提的。而主持東京清真寺落成儀式，以及與大日本回教協會同為回教圈展覽會舉辦方的，都是東京回教徒團。事實上，直到東京清真寺落成之前，擔任東京回教徒團團長的是一位名為馬合木提·阿布都海·庫爾班加里(Mehmet Abdülhay Kurbangali)的塔塔爾人^⑨。然而，他卻是一名被日本在滿洲「發現」的回教徒。

庫爾班加里出生於俄羅斯的巴什基爾地區。由於在地緣、民族、語言上的親緣關係，二十世紀初期流亡國外的塔塔爾人和巴什基爾人被統稱為塔塔爾人。庫爾班加里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時期流亡到中國奉天，1922年移居大連。據1923年8月15日關東廳警務局的「臨時報第三八〇號」，以「一直非常努力的庫爾班加里」為中心，「日本和支那人為了實現回教的大同團結，隨着正在興起的泛伊斯蘭主義運動，開始建設大連回教寺院，以便以此為根據地團結在滿十五萬回教徒，並以此為基礎爭取支那四百萬回教徒。為了實

現這一目標，在支那全土廣建回教寺院，使東西之間回教徒的來往聯絡更加便利。另外，還起草了光社章程，並散發給同情者廣泛進行宣傳」^⑤。

庫爾班加里之所以如此關注中國的回教問題，是因為他在1922年被剛剛就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理事的松岡洋右，以「囑託」（臨時職員）名義招收進了滿鐵本社調查課（日後的滿鐵調查部），「作為調查課的一員，負責回教方面事務」。在中國的東北地區，即滿洲地區，日本侵略勢力很早就注意到回教的作用。「以巴什基爾民族代表庫爾班加里也夫為中心」、1922年開始興建的大連清真寺的建設資金，一部分是由「居住在奉天的東干人阿訇張德純在京津地區奔走募集」，而另一部分則是由日本人佐久間貞次郎和山岡光太郎在京都、大阪地區通過捐款活動而徵集的，其後又得到了滿鐵5,000元的資助^⑥。

1924年，庫爾班加里從滿鐵退職後移居東京。通過對他在滿鐵時期和移居東京之後的工作內容進行比較，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他移居的原因。按照庫爾班加里的說法，他移居東京之後的主要工作是，「集結和聯合漂泊於世界各地、在悲慘命運中哭泣的回教白俄人，組織和創立回教徒連盟及東京回教徒團體，專門從宗教及民族的兩個方向展開反對運動」^⑦。簡而言之，就是將東京變為世界各地俄系塔塔爾回教徒反蘇俄的回教中心。庫爾班加里在東京的活動之所以能夠得到許多日本政治家、經濟界人士和大陸浪人的強力支持，應該與這一活動性質有關。在此意義上，庫爾班加里移居東京正是其滿鐵調查部工作的延伸，而其團結目標已不僅是「在滿十五萬」和「支那四百萬」的回教徒，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回教徒，他要向他們傳達一個親近回教、在此信仰能夠得到尊重，以及能夠生活安寧的日本—東京形象。

關於庫爾班加里在日本的工作，日後在他因為失去利用價值而遭到驅除時，日本外務省人員曾做過如此評價：「關於他雖有種種流言蜚語，但至少不得不承認他在我國近十五年間的回教及回教問題普及上做出的功績。」^⑧庫爾班加里不僅開通了回教界與日本政界之間的聯繫通道，而且組織回教團、實現在日塔塔爾人的組織化、開設回教學校和回教印刷所、建設東京清真寺，從而為建構日本作為「回教圈」的中心做出了許多貢獻。1932年，即滿洲國成立當年的11月，庫爾班加里以「日本回教徒連盟會長、東京回教徒團體長、東京回教學校校長」的名義回到滿洲，「與在滿二百萬回教徒的代表者一起，就將來的方針進行了協商」^⑨。據日本外務省〈滿洲的回教〉報告提供的數據，當時在滿洲各地居住的俄系塔塔爾人約為15,000人，大半居住在哈爾濱和海拉爾^⑩。對於居住在日本的勢力範圍（滿洲）的俄系塔塔爾人來說，日本帝國的東京回教徒團團長庫爾班加里無疑具有極大的權威，而他的這種形象自然又強化了人們對日本處於「回教圈」中心的印象。

然而，戰時日本為甚麼會從回教的角度關注滿洲呢？一位日本外務省調查部人員在〈滿洲的回教〉報告中的說法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滿洲的回教徒非常貧弱，其自身沒有甚麼值得研究的價值，但是由於回教徒居住於蘇聯與支那之間的帶狀地帶中，在北支方面也雜居着大量的回教徒，因此位於其最東端、直接與日本文化接觸的滿洲回教徒，應該更為矚目和值得研究。」^⑪由此

可見，滿洲回教徒的重要性是在能夠幫助日本牽制蘇聯與中國的層次上被認識的。所以，如果「將〔滿洲〕二百萬回教民族僅僅看作為一個宗教集團」，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⑤。

滿洲的塔塔爾人社群，從其反蘇俄的本質上來說，原本就對日本抱有親近感。關於這一點，1940年出版的滿洲鐵道總局弘報課編《滿洲宗教誌》曾經詳細說明：「滿洲回教徒對日本的態度頗為親和。在其信徒中，俄國革命當時從俄國避難到日本的土耳其塔塔爾民族中的回教徒，受到日本的保護，可以自由地信仰他們自己的回教，還可以對子弟進行教育，平安地生活。這個事實，不能不讓他們這些回教徒產生感謝之心，因此對日本的信賴非常深厚，尤其是他們對日本皇室的憧憬和敬慕非尋常可比。」^⑥但是國際社會對日本在滿洲的所作所為卻並不認同，小村不二男指出，1933年，「國際聯盟對日本軍隊從滿洲撤退的勸告書以42票對1票〔日本〕得以通過，松岡洋右主席代表表明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日本在國際上被孤立了」^⑦。也正是在這一年中，「突厥系穆斯林的大人物相繼流亡日本」。小村不二男注意到這一點，並在其著作中分析道：「右翼諸團體與軍部勾結的傾向愈來愈明顯，暗示着法西斯化正在到來。就在這種情勢中，日本伊斯蘭界卻因稀奇地出現了海外伊斯蘭圈的穆斯林大人物一個個來訪的現象而熱鬧起來。這其實並非是一種偶然，很可能是因為這些人感受到了此時日本在海內外地位上升，也愈加積極主動地向外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說，他們訪日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試探在未來形勢變化時長期流亡的可能性，而且是在盤算着日本大有可能成為日後東山再起之基地的行動。說得更加清楚一點，就是因為敏銳地洞察到了日本軍部的急劇抬頭，與其相伴為右翼所提倡的國家皇道主義的勃興。最早看破這一點的代表人物，即是庫爾班加里。」^⑧可以說，他們將靠攏日本視為一個改變自己民族悲慘命運的機會。

滿洲的塔塔爾人社群主要以營商為主，如大久保幸次、小林元在《現代回教圈》一書中所述：「要之，從哈爾濱到新京、奉天、海拉爾、滿洲里等地，居住在這裏的伊黛爾·土耳其人是從俄國東南部來的移民，是隨着俄國向東方發展而跑到遠東來的商人群體，可以說滿洲的伊黛爾·土耳其族的歷史生活幾乎就是以商業活動為中心。」^⑨因為與當地回教徒之間的穆斯林同志關係，滿洲的塔塔爾人的戰略價值更加引起了日本的興趣。據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鶴見憲指出：「回教徒在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後不久的昭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由東清真寺派青年教徒孫輯辰倡導，為了達到當地回教徒的融合團結的目的，以過去東西兩清真寺教徒（當時滿人11,000人、俄人1,500人、阿富汗人4人，合計12,504人）為其構成基礎組織了哈爾濱回教協進會。」^⑩其中的「俄人」就是塔塔爾人，可見日本方面很早之前已經注意到塔塔爾人的「回教徒」身份在聯繫當地回教徒上所起的作用。而《現代回教圈》一書更是直接指出：「將滿洲的伊黛爾·土耳其人的存在與居住於日本的同系的流亡者聯繫在一起議論並非無益，因為兩者在各個方面都保持着緊密的關係。」^⑪也就是說，日本如果能夠操縱國內的塔塔爾人社群，就能夠通過滿洲的塔塔爾人社群，進而將整個滿洲的回教徒牽引進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圈」。

五 超越了滿洲的「回教圈」半徑

塔塔爾人在日本和滿洲的活動，充分證明日本政府設定的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圈」半徑，事實上遠遠超越了已經進入了日本勢力範圍中的滿洲，甚至覆蓋了中國的西北部。小村不二男指出，「隨着事變〔「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幾乎與此同時，受到華北及北京當地回教徒極大信賴的川村狂堂為了統一滿洲回教徒，在長春開始了積極的活動。與此前後，從千馱谷移居到澀谷一帶的庫爾班加里，立即開始關注北方大陸方面回教民族的動向發展。即使身處流亡地的日本國內，但他仍敏感地觀察着回教問題今後會向何種方向進展」⁶⁵。到了1932年，庫爾班加里又抱着捨我其誰的氣概決心渡滿。而「從大正末期人數逐漸增加的居住於名古屋的塔塔爾系穆斯林，原本彼等多以滿洲的海拉爾、哈爾濱、舊奉天為流亡到日本的路線，所以當此次滿洲方面開始出現異常動靜後，他們立即響應並迅速開始行動。從中央亞細亞的突厥斯坦河畔到烏拉爾山麓地帶，居住在這裏的突厥系穆斯林，現在開始隨着日本，對戰鬥中的滿蒙的天地抱有了深深的關心」⁶⁶。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逐漸關注蒙古地區，其原因在於，「內蒙地帶才是通過絲綢之路連接東西突厥斯坦的回教徒密集地帶，進一步橫斷中央亞細亞大草原階梯地帶，只要一路西進就可以到達內陸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最短距離的起點」⁶⁷。新疆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意義也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被「發現」的。1937年末，一位姓鈴木的日本人與一位姓張的滿洲國人（張子文）一起前往麥加朝覲。但是此次朝覲的目的顯然並非那麼單純，因為日本的外務大臣一直不斷直接給日本駐埃及公使打電報，確認一行的日程等。翌年3月16日，橫山正幸公使向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發出一封極秘電報，報告說：「鈴木正在麥加與莫合默德、司儀江可及另外四名新疆人就到日本一事進行協商。」外務大臣廣田在接到電報後，第二天即電指示：「馬上進行全部同行歸朝〔即帶到日本來〕的準備，如其經費不足時請代為支付。」但是，橫山公使代為支付的200埃及鎊，卻是由參謀本部經理室的前岡少佐返還的⁶⁸。也就是說，通過回教的渠道接觸新疆回教徒（維吾爾族人），是由日本政府外務省和日本軍部一起策劃的。根據中國方面的史料，該鈴木大約就是鈴木剛，他在麥加時還曾經試圖接近當時前來朝覲的青海省主席馬麟⁶⁹。這些都能說明，戰時日本曾經試圖利用回教向中國內地、西北部和新疆地區發展。

日本的陸軍和外務省其實在此以前就有利用回教在中國發展勢力範圍的想法。在1938年的五相會議上正式提出「回教工作」⁷⁰以前，在外務省、陸軍省及關東、關西經濟界的支持下，1936年12月19日，日本成立了以林銑十郎陸軍大將（預備役）為顧問（會長）、遠藤柳作為理事長、佐久間貞次郎為常任理事的「回教文化協會」。實際上，該協會於1935年秋就開始醞釀，原本定於1936年2月成立，只是因為發生了「二二六事件」而被延期。協會設定的第一項工作目標就是：「開展與回教諸民族的親善事業，並在新京及北平開設支部」、「支援滿洲帝國」⁷¹。之後，1938年4月23日，在外務當局的主持下，

日本政府就設立「以探討回教及猶太教問題的根本對策、同時協調有關政府部門統一處理事務為目的」的「回教及猶太教問題委員會」達成了一致意見，成員包括外務省東亞局長、歐亞局長、亞米利加局長，以及調查部長、陸軍省軍務部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海軍省軍務部長、軍令部第三部長⁷²。

回教及猶太教問題委員會於1938年8月向內閣總理大臣及各大臣提出了〈關於建立回教對策〉的意見書，強調「回教徒的分布狀態、人口數及其特性，是帝國在對外發展上極為值得重視的問題，事實上在處理支那邊境時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因此確立根本對策實為燃眉之急」，指出「帝國回教對策的根本方針為獲得對回教徒最強有力同情者之地位，並將其利用於支援帝國的順利對外發展，尤其是對英、對蘇、對支的國策上」，並且提出了設立由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三個中央政府部門的有關人員組成的「回教委員會」，設立強化與「回教圈」地域關係的日本政府在外機關，以及設立作為日本民間最高回教問題調查機關的大日本回教協會等三點建議⁷³。

根據這項提議，1938年9月19日，大日本回教協會誕生。該會為日本至今「規模最大、陣容最強」⁷⁴的回教/伊斯蘭教關係團體，第一代會長林銑十郎為原內閣總理大臣。關於其就任大日本回教協會第一代會長一事，坂本勉如此分析道：「這一人事，可以說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以及隨着日中戰爭的全面爆發後軍部〔在中國問題上〕更加重視伊斯蘭教的象徵。」⁷⁵因為當年曾任日本「朝鮮軍」司令官的林銑十郎，在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居然抵制參謀本部的命令，而按照關東軍的請求派遣部隊越過國界進入了滿洲地區以支援關東軍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流亡外地塔塔爾人在日本的回教政策中固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毫無疑問，直到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以「回教圈」話語為象徵的建設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空間」的活動，一貫都是以支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為根本目標。

如前所述，堪稱二戰結束前日本伊斯蘭史集大成之作的小村不二男的《日本伊斯蘭史》，梳理了日本的伊斯蘭史和政策沿革史：

昭和六年，是大正—昭和時代的歷史潮流發生激烈變化、走到轉折關頭的最為值得注意的一年。簡而言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裁軍」時代以來一直忍受無所作為之屈辱的軍人得以再次炫耀力量、回到軍國主義時代的第一年。……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此軍國主義的異常的膨脹形成正比，我國的伊斯蘭研究熱更加旺盛，其必然結果就是明治—大正時代以來從未見過的機關、團體一個一個地問世。……如果說得更加具體明瞭，就是昭和六年秋爆發的「滿洲事變」吸引了日本國民對中國北方大陸的關心，至此方得以知道以當地民族之名居住於此的回教民族，及其從宗教上來看與遙遠的阿拉伯沙漠和突厥斯坦草原連成一線〔的情況〕，這也成為使研究回教在日本成為熱潮的誘因。

從該書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看出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興起，與當時日本社會的「伊斯蘭熱」之間的內在關聯⁷⁶。

六 結語

日本政府在1930年代所建構的「回教圈」話語，就是為了在東亞地區創造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回教空間」。其目的當然就是在其侵略的前線——中國，通過「發現」和培植一種日本與周邊國家或地區關係密切的「共同體意識」，為其侵略活動尋找正當化根據，並由此軟化當地民眾的反抗心理。然而，要想加諸人們一種新的「共同體意識」，就是要人們放棄過去的「共同體意識」。換言之，日本在中國「發現」新的「共同體意識」的目的，就是為了抵消中國國民原有的「共同體意識」。而以日本侵華戰爭為背景，中國國民當時開始形成的「共同體意識」，就是「中國人」這樣一個以「中華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民族主義意識。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儘管本來並沒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傳統，戰時日本為甚麼會如此着眼於「回教」這樣一個宗教的概念，並致力於建立一個宗教的「共同體」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當然不能無視宗教具有跨越國界的力量，以及宗教的「共同體」並不以國家為單位的特性。歷史已經多次證明，利用宗教的名義，不僅可以將戰爭正當化，而且可以跨越國界、民族、人種的壁壘，將更多的民眾動員到戰爭體制中去。戰時日本的「回教圈」話語，當初就是為了跨越「中華民族國家」的高牆而被「發現」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中華民族國家思想為代表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恰恰就是受到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啟發，從日本直接學習到的。近代日本在動員國民意識形態上發揮了極大作用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原本就是強調一種內外有別的意識形態，因而成為拒絕接納他人的壁壘。因此，日本要想將其對中國的侵略和擴張正當化，便不得不在「民族」之外「發現」一個新的、能夠突破「民族國家」範疇的「共同體」。

筆者曾經指出，日本從發動戰爭之前就開始製造「中華思想說」，利用它在中國邊境地區的民族集團中尋找歷史上與日本同樣受過中國大國思想迫害的共同歷史記憶^⑦。而本文敘述日本在新疆地區「發現」「同胞民族」、在東亞建構「回教圈」，其實質都是為了建立衝破「民族國家」範疇的「共同體」。毋庸贅言，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出現的「大東亞共榮圈」話語，同樣源於這種思維模式。在日本國家以外打出「圈」的概念，顯然就是為了避開「單一民族國家」所帶來的各種尷尬和困窘。然而由於日本「中心」的虛構性，包括「回教空間」在內，日本在其侵略的前線建構國外民眾與日本之間的「共同體意識」的各種努力，都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當年日本「發現」的「回教圈」，最終也不過是成為了一道跨越中日兩國民族國家高牆的幻影而已。然而，近代日本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它為甚麼會利用「回教圈」這樣一個宗教的話語來正當化其侵略行為，卻是一個值得今天的國際社會認真進行再思考的問題。這段歷史同時證明：當一個國家為了其民族國家利益，或者是一個政權出於打破國內政治和經濟困局的目的，而向國際社會尋找出路時，不論用甚麼名義進行包裝，不論如何編織與對方的「共同體」關係，最終都掩藏不住其中的私心和私利。

註釋

- ① 本文內容的時代背景為1920至1940年代前期，當時在中國和日本社會中一般都稱呼伊斯蘭教為「回教」（回々教），為尊重文獻原著，本文一般使用「回教」、「回教徒」。由於當代中日文均不再使用「回教」、「回教徒」而使用「伊斯蘭教」，加上當年的日文文獻中還時有「イスラム」/「イスラーム」(Islam)一詞出現，故本文敘述當代問題以及引述文獻中出現該詞時，便使用「伊斯蘭教」。
- ② 楊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全書65頁，除附錄外，涉及「日本之回教政策」的內容只有42頁。
- ③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東京：日本イスラーム友好連盟，1988)。
- ④ 松長昭：《在日タタール人—歴史に翻弄されたイスラーム教徒たち》(東京：東洋書店，2009)；渡邊賢一郎：〈戦前期の神戸におけるタタール人の集住と活動—移民・コミュニティ・ネットワーク〉，《東洋大學人間科學総合研究所紀要》，第5號(2006年3月)，頁206-183〔47-70〕；ウスマノヴァ・ラリサ(Larissa R. Usmanova)：〈戦前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テュルク・タタール移民の歴史的變遷に関する覺書〉，《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0號(2006年1月)，頁45-66；“An Historical Account to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urk-Tatar Diaspora Consciousness in North East Asia between 1898 and the 1950s”(島根縣立大學博士論文，2006)，簡約版為〈民族の獨立とファシズムへの傾斜—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テュルク・タタール移民コミュニティ(講演録)〉，載貴志俊彦編著：《近代アジアの自畫像と他者—地域社會と「外國人」問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頁369-81。
- ⑤ 重親知左子：〈宗教團體法をめぐる回教公認問題の背景〉，《大阪大學言語文化學》，第14卷(2005)，頁131-44；坂本勉編著：《日中戦争とイスラーム—滿蒙・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統治・懷柔政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8)；島田大輔：〈昭和戦前期における回教政策に関する考察—大日本回教協會を中心に—〉，《一神教世界》，第6卷(2015年3月)，頁64-86。
- ⑥ 本文所使用的日語檔案資料中，該組織時而被稱為「東京イスラム教團」，時而又被稱為「東京回教徒團」，為免混淆，在敘述時統一作「東京回教徒團」。
- ⑦ 〈回教徒視察團の日程〉，載大日本回教協會編：《記錄回教圈展覽會：全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會來朝回教徒視察團》(東京：大日本回教協會，1940)，頁23-25。
- ⑧ 在厚和總領事代理望月靜：〈大日本回教教會主催回教圈展覽會二蒙古代表者參列者二關シ報告ノ件〉(1939年11月6日)，載《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第二卷，「11.回教圈展覽會」。參見亞洲歷史資料中心(JACAR)，Ref. B04012294800, 0028。(本文引用JACAR所收的文獻時，如原文頁碼闕如或未能辨識，則註明JACAR給出的頁碼。)
- ⑨⑩⑪⑫⑬ 〈回教圈展覽會來朝代表者〉，載《記錄回教圈展覽會》，頁3。
- ⑭⑮⑯ 王柯：《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國研究—中國の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頁44-48、79；39-40；80。
- ⑰ 參見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查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戦争から支那事變迄)》(1939年10月)，尤其是第2章，「マフムツドの對日工作の實狀」。參見JACAR, Ref. C13021598500。
- ⑱⑲ 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查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戦争から支那事變迄)》，第2章，「マフムツドの對日工作の實狀」。參見JACAR, Ref. C13021598500, 1102。
- ⑳ 三浦總領事：〈三八六八二〉(1939年11月2日)，載《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第二卷，「11.回教圈展覽會」。參見JACAR, Ref. B04012294800, 0027。
- ㉑ 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查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戦争から支那事變迄)》，第2章，「マフムツドの對日工作の實狀」。參見JACAR, Ref. C13021598500, 1104-1105。時任日本駐孟買領事福井(疑為福井淳)給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電文：「麻木提在新疆回教徒中受尊敬，在我對回教政策乃至對新疆政策上，如我國有利用該

人意向，應該向該三人發給證明書。」但是關於時間，福井電文指印度方面要求麻木提在1939年2月22日以前離開。參見福井領事：〈四五二三〉（1939年2月16日），載《本邦二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3。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600, 977。

⑲ 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査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戰爭から支那事變迄）》，第3章，「亡命ウイグル族の動向」。參見JACAR, Ref. C13021598600, 1105-1106。

⑲⑳㉑㉒ 蒙古軍事顧問部調査部：《回疆獨立運動ノ概説（獨立戰爭から支那事變迄）》，「結言」。參見JACAR, Ref. C13021598700, 1108-1109；1106；1106-1107；1107-1108。

㉓ 外務次官：〈回教徒ノ本邦視察ニ關シ便宜供與方依頼ノ件〉（1939年11月7日），載《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第二卷，「11.回教圈展覽會」。參見JACAR, Ref. B04012294800, 0031。

㉔㉕㉖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198；203；306、337。

㉗ 滿洲回教協會：〈滿洲回教協會訓令第14號、關於大日本回教協會主催回教圈展覽會希望滿洲回教出品之件〉，《回光月刊》，第1卷第11期（1939年10月），頁48。

㉘ 滿洲回教協會：〈參加日回教展覽之全滿洲回民代表一行6人於寒風凜冽中啟程東渡〉，《回光月刊》，第1卷第12期（1939年11月），頁47。

㉙㉚㉛ 大日本回教協會、東京イスラム教團：〈回教圈展覽會計劃書〉（1939年8月），載《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第二卷，「11.回教圈展覽會」。參見JACAR, Ref. B04012294800, 0012-0013；0012；0013。

㉜ 〈世界回教徒第一次大會概要〉，載《記錄回教圈展覽會》，頁20-22。

㉝ 京都市長筱原英太郎、大日本回教協會會長四王天延孝、大日本回教協會京都支部長稻垣孝照：〈「大東亞戰下ノ回教圈展覽會」後援名義使用方依頼ノ件〉（1943年1月6日），載《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第二卷，「11.回教圈展覽會」。參見JACAR, Ref. B04012294800, 0039。

㉞ 警視總監安倍源基：〈東京回教團寺院落成式典開催狀況ノ件〉（1938年5月16日），載《本邦二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2。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500, 776-78。

㉟ 在ペイルート小長谷領事：〈東京回教禮拜堂ニ關スル件〉（1938年4月22日）、小長谷領事：〈一一一六九〉（1938年4月20日），載《本邦二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2。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500, 691、720-23。

㊱ 在ペイルート領事館事務代理大原口〔缺字〕一郎：〈日本ト回教徒ニ關スル新聞論調報告ノ件〉（1938年3月7日），載《本邦二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2。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500, 688-89。

㊲㊳㊴㊵㊶㊷㊸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頁94；95；428-29；80；76；76；100；94；74-75。

㊹ 田村愛理：〈回教圈研究所をめぐる——その人と時代——〉，《學習院史學》，第25卷（1987年3月），頁27；〈別添回教圈展覽會開催ノ件ニ關シ調査部三浦課長ヨリ左ノ通申越シアリタリ〉（1939年8月23日），載《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第二卷，「11.回教圈展覽會」。參見JACAR, Ref. B04012294800, 0011。

㊺ 參見《宗教團體法》（1939年4月8日 法律第七七號），<http://home.soka.ac.jp/~tnakano/dantai.html>。

㊻㊼㊽㊾㊿ 重親知左子：〈宗教團體法をめぐる回教公認問題の背景〉，頁132；140-43；142；143；132；143。

㊿ ウスマノヴァ・ラリサ：〈戦前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テュルク・タタール移民の歴史的變遷に關する覺書〉，頁53。

- ⑤⑩ 〈回教(及猶太)問題委員會ノ設置及經過〉(日期不詳)・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3。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600, 856。
- ⑤⑪ 關東廳警務局：〈臨時報第三八〇號 在滿回教徒ノ統一計劃〉(1923年8月15日)・載《關東都督府政況報告並雜報》・第十七卷。參見JACAR, Ref. B03041583400, 0307-0308; 0307。
- ⑤⑫ 山口縣知事岡田周造：〈在日本回教徒連盟會長渡來東上ノ件〉(1932年12月20日)・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一卷・分割1。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100, 19; 20。
- ⑤⑬ 回教研究會：〈外務省歐亞局第一課今岡囑託報告(速記)〉(1937年12月6日)・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一卷・分割3。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200, 481。
- ⑤⑭ 東亞局第三課牟田副領事：〈滿洲の回教〉(1938年2月7日)・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1。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400, 628; 646。
- ⑤⑮ 〈滿洲回教民族ト現在ノ動向〉(1937年9月)・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一卷・分割2。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100, 355。
- ⑤⑯ 鐵道總局弘報課編：《滿洲宗教誌》・復刻版(東京：株式會社クレス出版・2002)・頁204。
- ⑤⑰ 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ーム史》・頁79。事實上、「李頓報告書」以40票對1票通過。
- ⑤⑱ 大久保幸次、小林元：《現代回教圈》(東京：四海書房・1936)・頁307; 313。
- ⑤⑲ 在哈爾賓總領事鶴見憲：〈哈爾賓回教徒ノ反共運動ニ關スル件〉(1938年3月22日)・載《各國ニ於ケル反共產主義運動關係雜件》・第三卷・「27. 哈爾賓回教徒ノ運動關係」。參見JACAR, Ref. B04012984800, 1212。
- ⑤⑳ 在埃及橫山公使：〈回教徒ノ本國渡來ニ關シ助力方ノ件〉(1938年3月17日)・載《各國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2. 滿洲國」。參見JACAR, Ref. B04012550300, 158-61。
- ⑤㉑ 鐵維英、李學忠：《中國穆斯林朝覲紀實》(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頁190-91。
- ⑤㉒ 王柯：〈日本侵華戰爭與「回教工作」〉・《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頁87-105。
- ⑤㉓ 回教文化協會理事會：〈回教文化協會創立報告〉(1936年12月20日)・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一卷・分割2。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100, 349。
- ⑤㉔ 〈回教(及猶太)問題委員會ノ設置及經過〉・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600, 856; 回教(及猶太)問題委員會：〈回教及猶太教問題委員會內規〉(1938年8月)・〈回教及猶太問題委員會ニ關スル件〉(1938年8月)・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3。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600, 919・918。
- ⑤㉕ 回教及猶太教問題委員會：〈回教對策樹立ニ關スル件〉(1938年8月)・載《本邦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第二卷・分割3。參見JACAR, Ref. B04012533600, 916-17。
- ⑤㉖ 坂本勉：〈アブデュルレシト・イブラヒムの再來日と蒙疆政權下のイスラーム政策〉・載坂本勉編著：《日中戰爭とイスラーム—滿蒙・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統治・懷柔政策》・頁26。